

徐浩良：与联合国结缘

·陈彩霞·

6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了一个重要消息，任命来自中国的徐浩良（见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他是联合国系统中为数不多的高级别官员之一，也是非政府委派的最高级别的中国级雇员。

二十多年来，从国内理工科毕业的高材生到美国名校政策管理学硕士，从上海到大洋彼岸的纽约，从半工半读到与联合国结缘，徐浩良一步一个脚印，实习生长为联合国高官。

实习生的蜕变

1961年，徐浩良出生于上海虹镇老街。他此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回忆称，自己从小喜欢在家中的天井里仰望天空，看飞机从空中飞过，想象着跟随飞机去往远方。

带着这样的想法，从中国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毕业5年后，他放弃了国内稳定的工作，于1988年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在此后的岁月里，徐浩良经历了很多打工的心酸和择业的彷徨，在曼哈顿骑自行车送外卖，在新泽西开车帮人搬家，在报社负责录入赛马信息……承受着巨大经济压力，半工半读的他，硬是咬着牙扛了过来。

199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徐浩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个部门找到了一

份实习工作。由于工作非常努力，实习结束后，他获得了一份为期15天的聘用合同，开启了他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第一步。

“15天合同到期后，再续15天，后来延长到30天，又延长到3个月。就这样通过不断续签短期合同，逐渐在联合国立住了脚。”徐浩良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直到有一天，我获得了一份驻哈萨克斯坦的合同，为期2年。”

1999年年底，在联合国工作了5年的徐浩良终于摆脱“实习”和“兼职”的身份，签下了一份正式合同。

此后，他在联合国总部以及亚太、欧洲和中亚的多个地区办事处工作过，敢闯敢拼、勤奋坚持，一路晋升成为了这个国际组织中为数不多的来自中国的高级别官员。

在此期间，徐浩良一直在亚太地区、欧洲和独联体地区和联合国总部工作。曾任开发计划署欧洲和独联体局项目官员，亚洲与太平洋局项目官员，联合国驻哈萨克斯坦协调员暨开发计划署驻哈萨克斯坦代表等。

自2019年以来，徐浩良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开发计划署政策局局长。2013年

至2019年，他担任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

名副其实的工作狂

在国际组织工作，背后其实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艰辛。由于联合国总部纽约与亚太国家有时差，所以在亚太局工作的徐浩良养成了晚上继续工作的习惯。在他看来，及时回复邮件，能更高效地处理问题。

为了解各国国情，过去二十多年来，徐浩良到访过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年中差不多一半的时间都在出差。他和工作人员们要常常深入贫穷落后地区，身处险境也是家常便饭。

徐浩良曾回忆，他在东帝汶的时候，住房条件很差，用水用电和医疗都没有保障。当地犯罪率高，自己住的地方就曾被盗过两次。还有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他遇到了北部地区的武装动乱，甚至遭遇爆炸事件……

除了身处险境，让徐浩良感触最深的，还是全球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贫富差距等问题。作为联合国机构高官，徐浩良经常会参加一些高规格的会议，聚光灯下光鲜的场景，总会让他想起那些去过



的贫穷落后的地方。

“想到这个世界上的贫富差距还如此巨大，我的内心很难平静。每当这时，我总会提醒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值得我们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问题的关键不是绝对平等，而是社会发展的公正性和可持续性。”徐浩良说。

古特雷斯曾评价道，“徐浩良在多个任务区领导了大规模的变革进程，建立了高绩效团队，并显著地提升了效率。他非常重视明确的战略愿景、协作文化和持续创新的思维模式，与同事合作提供有影响力的发展解决方案。”

心系祖国发展

过去24年对徐浩良而言，既是他个人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他见证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

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纪念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称，“中国已成为联合国工作日益重要的贡献者和国际合作的一大支柱。”

徐浩良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称，虽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对世界产生着影响。未来，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影响无疑将更加深远。

徐浩良强调，过去50多年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重视，期待中国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他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打通贸易投资通道，为国际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愿景。

虽然远在纽约，徐浩良多年来一直牵挂着家乡的发展。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他积极参与到和中国有关的项目中，希望能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1999年，他参与联合国筹措资金与上海市政府达成合作的工作，发起了一个城市信息化建设项目。

徐浩良曾说，“作为一个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我感到非常自豪。”桥梁系出身的徐浩良虽然选择了不同于所学专业的职业道路，但他一直不忘初心，始终发挥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为中国与世界架起一座沟通合作之“桥”。（摘自6月27日中国新闻网）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美国最危险的人”

当地时间6月16日，被称为“美国最危险的人”——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美国国防部前军事分析师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见左图），在家中病逝，终年92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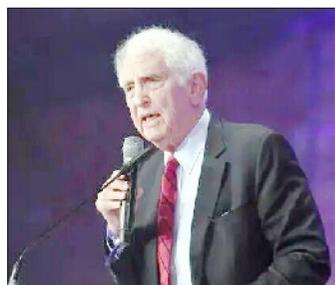
披露越战机密文件

公开资料显示，埃尔斯伯格于1931年4月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6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

在成为泄密者之前，埃尔斯伯格有着良好的社会地位，是政军两界的精英人物。他曾参加过越战，并通过了最高级别的安全审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他都得到了政府官员的信任。

1971年，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泄露了长达47卷、7000页的“五角大楼文件”，披露“美国知道越南战争是‘无法打赢的’”，揭发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越战问题上大话连篇，欺骗民众支持战事，引发全美轩然大波，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轰动的媒体泄密案之一。

他是如何接触到这些



▶1967年10月21日，美国华盛顿，示威群众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集会



机密文件的？这与他的工作经历密切相关：

1964年，埃尔斯伯格加入了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团队，直接负责越南政策工作。1967年，作为美国国务院派驻越南的工作人员，他“从鹰派转为鸽派”，并得出结论：“战术上的改变或美国资源的重新分配都无法扭转战争局势。”

从越南回国后，埃尔斯伯格重新加入美智库兰德公司，但直到1969年，他仍继续担任美政府战争顾问。这段时期，他可以接触到相关机密文件。

在泄密事件发生后，尼克松开展了一系列报复行

为。然而，这些报复手段屡遭失败，先是高等法庭裁定容许《纽约时报》等媒体继续发布文件；其后，尼克松政府拟以间谍及阴谋罪起诉埃尔斯伯格，亦以失败收场。

白宫还派特工潜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科医生办公室，企图偷取埃氏医疗记录来抹黑他，并非法窃听了其电话内容。由于该事件与“水门事件”扯上了关系，最终导致尼克松遭弹劾下台。

曝光美军对华“核讹诈”

2021年，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披露了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撰写于1966年的美军研究报告显示，在1958

年8月23日炮击金门战役开始后，美国军方高层自己都怀疑能否以传统武器成功“协防台湾”，因此考虑过对中国大陆发动“核打击”。《纽约时报》报道称，尽管美国官员们当时认为，苏联很有可能对针对中国的核攻击作出报复性核打击。但是，他们还是更倾向于冒这个风险，以免失去这些岛屿。最终，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将军们的观点，决定首先依靠常规武器。

耶鲁大学专门研究冷战和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奥德·阿尔内·韦斯塔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信息有重要意义。他说，“在我看来这至少证实了”，在1958年危机期间，“美国比我从前认为的更接近于使用核武器”。

埃尔斯伯格的泄密让美政府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并不断展开报复行动。即使生命遭受威胁，埃尔斯伯格也没有丝毫动摇。他曾经解释道，在当时，很多年轻一代的公众人物为了表达反战观点和对政府错误发动越战的指责而被捕入狱。他们即便牺牲自由也要向社会公众传播自己的想法，是他们给了我鼓励。（摘自6月19日微信公众号“湖北日报”陈映午 张逸云文）

（上接第1版）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介绍高岗等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事实，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了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维护群众权益时一视同仁

1949年3月18日，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应中共中央邀请，由香港抵达北平，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起初，他被安排住在六国饭店，后因国民党谈判代表临时入住，被移居至颐和园益寿堂。

到颐和园后，柳亚子觉得受到了慢待，开始发牢骚，在生活上提出苛刻要求，后来又打门卫、骂哨兵、打管理员，甚至说要“投湖”“上吊”。有关同志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

周恩来没有因为柳亚子的特殊身份而姑息迁就，决定以设宴招待的方式对其进行批评和规劝。见面后，周恩来简单介绍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破裂，我30万大军渡过长江等情况。随后，他话锋一转，对柳亚子的行为提出严肃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牢骚太盛，并以朱德、陈毅和其他民主人士朋友为例，说明不许骂人、打人的道理，强调应当尊重身边工作人员、门卫、警卫战士，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礼节性地敬完酒，周恩来就起身告辞，促其悔悟。（摘自《红岩春秋》2023年第1期）